

哲学视角的中西方管理范式的比较与展望

刘嘉华 | 文

发端于不同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方管理思想，无论在理论形态抑或管理本质上都存在差异。本文从管理学的社会形态根源出发，以哲学视角探索中西方管理范式的形成根源，并据此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发展进行展望，以期对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拓展新的视野。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是多元统一的整体，管理学的发展必将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彼得·德鲁克强调管理会受到文化传统、习俗及社会价值的支配。西方管理学如何在中国情景中进行应用，本文以哲学的视角在对中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根源探讨的基础上，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提出探索性思考。

中西方管理范式探源与比较

戴国斌认为管理实践包含哲学、艺术和科学3类学科元素，对管理实践的研究可以采用哲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广义的哲学研究和广义的科学研究结果是实现哲学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据此通过基于哲学视角进行中西方管理范式的理论根源的探源与评析，探索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哲学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合路径。

1. 基于价值根源维度

在价值根源的哲学命题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经历了从唯心的宗教创世说到机械唯物论的演变过程，究其根源是因为对西方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基督教教义中崇尚性恶论，即人生下来是有原罪的，人生活是为了赎罪。所以管理的价值根源在于制定严格的制度来防止人性的恶念，相

信制度控制而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西方管理学的价值根源。中国的价值根源从诸子百家兴起，发展至儒学之独尊，儒家学说相对诸子百家学说涵盖政治、哲学及实践方法。儒家学说在哲学层面上注重对人的心理关照，性善论是儒家之核心价值根源，也是中华民族的处事之根源，从而中国管理理念更多的依赖人治而非法治，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弱化了制度控制的管理标准化。

2. 基于价值观维度

在西方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哲学经历了由唯心到唯物的追求宇宙观演化过程，对物质的追求被无限的放大。20世纪初尼采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这导致了资本代替了上帝，人异化为工具的社会形态。从而在管理理念上演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对物质索求，使人沦为经济人，产生追求工作标准化体系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的科学管理思想，同时立足于个人人权的价值观进一步削弱群体的形成和团体的团结。即使后来出现了社会人和知识人假设，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其哲学价值观基础上的物质索求。中国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发展观，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经以易理来说明宇宙人生现象和道理，即世界是不可分的，世界是由天、地、人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是在实践与理论之间相生相胜的协调过程。使中国管理思想的理念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总是兼顾人情和相关利益，儒家的舍利取义思想对经营理念影响巨大，从而使儒商文化烙印深重。

3. 基于核心价值体系维度

西方管理学构建于天赋人权的西方价值体系之上，由基督教引发的天赋人权及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形成了强调自我，崇尚分权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商业价值体系，虽极大地调动了主观能动性却导致了缺乏社会责任感，进而极易引起责任危机的发生。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以义为其核心逻辑，讲求君子重义轻利，强调义的重要性，强调本我，君子为义可舍生忘死。从而使中国的管理核心价值体系孕育了浓厚的人情世故，在考虑自身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习俗及道义和规矩，从而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集权管理情境。

4. 基于哲学史体裁维度

西方哲学史的叙述式体裁形式对逻辑性的重视，致使西方管理理论以形式的逻辑性阐述问题，即对管理现实的来龙去脉进行描述，运用具体的方法和模型进行精量表述，形式上科学严谨，但往往缺乏内在逻辑的关照，其对西方管理学的影响在于其注重理性的实证定量研究；而中国哲学史的选录式体裁更关注的是具有超现实意义的本质索求，以对本质的哲学思考为主，确定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忽视了其具体形式的逻辑性，其对中国管理学的影响在于其以定性研究见长，而对定量研究注意不够。研究方法不易掌握，其普世意义也引发商榷。

5. 基于思维逻辑维度

受西方哲学体裁的影响和传承，使西方的思维逻辑更侧重于外在的直线性思维，对事物的处理以客观事实为直接逻辑依据。不强调融入人的客观情境，其对管理思维的影响是对规章制度的高度执行，对管理理论的坚决贯彻，强调管理的规律性和科学性。而中国哲学的思维逻辑受儒家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受易经的影响，认为世界万物，相生相胜，往复不息。对中国管理思维的影响主要是对人的管理和控制，认为一切以人为中心，事在人为。从而忽视了对规章与制度的要求，对事情的管理更多的考虑融入人的因素的情境，处理事情更加强调因人而异的柔性管理。

6. 基于方法论维度

文艺复兴之后，太阳中心说的建立使西方世界由宗教神学转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都变成了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界限清晰，其割裂性表现在对问题的分解，分解到能够客观量化操作为止。西方管理学重点在法、器即方法和技术，因此西方重视管理的科学性，即技术化、工具化、程序化、模式化，

具有操作性强的理性特点。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上相对于西方重视法、器研究，则更重视道、术的修为，强调对管理内在规律的感悟和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天人合一、阴阳合德的理念。更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强调管理的内在统一及人性化决策的特点，具有执行力强、行动迅速的特点。能更快地适应市场，但主观因素过于强大，易陷入决策的简单化、感性化的误区，对操作层面控制略显不足。

从哲学视角的六个维度依次推演可清楚地知道西方管理的关注重点是管理的外延层面，是对管理规范的追求、具有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在经济基础层面具有科学的方法论，但缺乏对人性、整体观的深刻思考。中国管理的关注重点是人，关注管理的内涵层面，关注管理现象的本质侧重于和谐思考及对人的关注。但其在操作层面上灰度技巧有余而规范化不足。诺伯特·艾利亚斯认为社会中国有现象的相互密切交织规律，既不能与个人思维的精神规律性等同，也不能和自然的物质规律性等同，尽管事实上所有方面无可替代地在功能上相互联接在一起。因此，如何很好地在中国特色下实现中西方管理哲学的有机结合，使物质与精神实现统一，完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完美对接，以期对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探索路径开拓新的视野。

基于哲学视角的中国管理学研究范式展望

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的事物有机结合在一起，不同音调可构成最美的和谐。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和谐，没有对立面的结合就不会有统一。从对中西方管理哲学根源与管理范式的探源和比较可以看出，哲学影响着相应管理范式的基本走向和发展模式，中西方管理学之间并不是简单地被取代，而应是被有机组合，从而产生新的状态。中西方管理范式的融合与借鉴将会成为今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趋势。

基于中西方管理哲学根源与管理范式的对应关系，探索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可采用四轮驱动模式，四轮驱动模式的中国管理学具有管理范式应具有三要素，即理论、制度和方法论。其中，前面两轮代表管理理论即管理思想及原理，分别由中国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原理构成，后面两轮代表管理方法即管理技巧与技术，分别由中国管理方法和西方管理方法构成。前面两轮是主方向轮，后面两轮是主动力轮。即管理理论的进步离不开方法论的驱动，而方法论的发展离不开管理理论的指引和制约。四轮的逻辑

制度关系为：动力轮是方向轮前进的动力，方向轮引导动力轮前进方向。而链接四轮和谐互动顺利前行的就是制度，制度是实现理论到方法的途径，是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衔接。不同的管理情境塑造了不同的制度链接方式，此模式亦具有哲学的易经四象关系内在关照，西方管理范式偏重刚性，视为阳爻。中国管理范式偏重于柔性，视为阴爻。太极化为两仪，两仪生成四象（四轮），四象中的阴阳关系，为四轮驱动模式提供内在的逻辑机制指引，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通过太极思维阴阳合抱互相转化互动，重化解而不是解决，通过四象的运转涵盖中国管理学范式存在的时空二维世界，通过阴阳结合内化互动演绎，形成适应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应用于中国管理实践可运转无穷。

李昆认为企业管理应是道法术器的有机统一体，管理的实践不能脱离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基础。中国管理思想内在关照是道，西方管理原理内在关照是法，中

国管理方法的内在关照是术，西方管理方法的内在关照是器，中国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四轮驱动模式很好地实现了内儒外法，由人治回归到法制的一种规范研究范式展望。形而上的道必须借助于形而下的器才能彰显功用。中国许多企业成长过程中用术居多而无法体现道的指引，中国企业管理升级完全西化向法的转化过程中，极易导致向法的跃进失利而惨遭淘汰。究其原因，术到法的跃迁必须经过道的调和，中国管理学四轮驱动模式通过用阴用阳的指引实现术、法的良性链接，以化为变完成术到法的跃迁；并有由器到法到道及由器到术到道的两条路径的支撑，以迂为通实现器对道的彰显，辅以管理实践加以校验，可实现中国企业管理道法术器的统一，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作者简介：刘嘉华，(1982-)，男，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企业管理